

刘 焕 辉

语言的妙用

—— 鲁迅作品语言
独特用法举隅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语言的妙用

——鲁迅作品语言独特用法举隅

刘 焕 辉



湖北人民出版社

50623/7

语言的妙用

——鲁迅作品语言独特用法举隅

刘 焕 辉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125印张 64,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100

统一书号：7106·1611 定价：0.26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词语的创新用法	7
(一) 特造	8
1. 利用汉语同音词的谐音双关作用, 造词寓意	9
2. 利用汉语传统的语义造词法, 临时造词寓意	11
3. 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 临时造词寓意	13
4. 特造符号, 代替词语的书写	14
(二) 仿造	16
1. 顺其意而仿之	16
2. 反其意而仿之	17
(三) 翻造	19
(四) 易词	22
(五) 古语词和外来音译词的灵活借用	25
二、词类的精采活用	31
(一) 名词当动词用	32
(二) 形容词当动词用	34
(三) “们”字的特殊用法	35
(四) 连词的重复和叠用	37
(五) 连词和介词的特意混用	40
(六) 数词的特意变动	43
三、句子的特殊组织	47

(一) 句子成分的特意添补·····	48
1. 特加的主谓结构·····	48
2. 特加的状态·····	49
3. 特加的定语·····	51
(二) 句子成分的特意省略·····	52
(三) 同位成分的多重迭用·····	54
(四) 独词句的警辟用法·····	55
(五) 句子结构的特殊组织·····	57
1. 看似重复, 实为精辟·····	57
2. 看似矛盾, 实为警策·····	58
3. 看似曲折, 实为深入·····	59
4. 看似打岔, 实为补充·····	61
(六) 句群的特殊组织·····	62
四、标点符号的独特用法·····	67
(一) 逗点特停, 寄寓深意·····	67
(二) 括号注释, 不同一般·····	71
(三) 省号非省, 话藏其间·····	73
(四) 引号非引, 遣词灵巧·····	77
(五) 破折号后, 再起新笔·····	81
(六) 标点夹注, 以代文章·····	88
初版后记·····	92

引 言

这是一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谈鲁迅作品的语言艺术——而且是专就其中某些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发表议论的带有探讨性的小册子。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形式。独特的语言形式，总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为着某种特殊的表达需要而采用的。因此，若能根据思想内容的表达需要，联系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和汉语书面语言的历史特点，对鲁迅作品语言的某些独特用法作一番科学的考察和探讨，这对于一般读者正确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领会作者当时之所以要那样表达的艺术匠心，作为写作的借鉴，该是有益的；对于一个语言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

鲁迅作品的语言之所以值得探讨，就在于它产生于文言和白话新旧交替的时代，并对汉语书面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变革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他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不仅以自己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创作实践，“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同时，还在白话文突破文言文的重围、胜利夺取文学语言地位的斗争中，以自己成功的语言实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五四”运动前导的白话文运动，首先是在文艺阵地

上取得进展的。鲁迅正是在这一阵地上第一个用白话从事文学创作的最成功的语言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过鲁迅的语言在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方面所发挥的战斗作用，指出鲁迅“用他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因而称赞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一般的画家，他所凭借的手段是线条和色彩；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无论是刻画敌人的鬼脸，还是描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则是凭借其熟练掌握的现代汉语这一工具的。在鲁迅作品中，我们既可普遍看到祖国语言的最正确、最精当的典范用法；同时又可看到为了战斗的某种特殊需要，灵活采用的一些出奇制胜的独特用法，两者同样说明鲁迅对祖国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是何等驾轻就熟。

我们研究鲁迅作品的语言，当然要注重研究其典范性的基本用法，但对那些独具匠心的特殊用法也不可轻易放过。曹靖华同志曾在一篇回忆鲁迅谈写作的文章中说得好：“作者写作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付出了宝贵的心血。读者对这些也应双方兼顾，读后都能如鲁迅先生所劝告的‘有所得’”。这里所说的“形式”，无疑包括语言的表达形式中那些独具匠心的特殊用法。无论写作或阅读，都得借助语言作为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思想联系的桥梁，作者要能“达意”，读者要“有所得”，离开了语言这个桥梁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阅读鲁迅作品时，要想做到“双方兼顾”，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得”，首先就不能不在语言上下功夫——包括对那些独特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如果连语言都理解偏了，理解错了，就谈不上正确理解作者的思想内容，更谈不上领会作者运用

语言的艺术匠心了。

语言形式总是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研究作品的语言形式，一定要联系作者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思想表达的需要来进行。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一文中提出了论文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论文要顾及全篇、作者全人和社会状态，那么研究鲁迅作品的语言——尤其是其中那些独特用法，同样不能脱离具体语言环境的表达需要而孤立地进行。由于鲁迅用笔战斗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及其本人思想的深刻性，我们分析鲁迅作品的语言，特别是分析其中一些独具匠心的特殊用法，就不能孤立地就词解词、就句子分析句子，更不能望文生义，主观臆测。“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假研究鲁迅之名，行为帮所用之实，就是利用一些同志对鲁迅著作中某些话的具体语言环境不了解，从而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结果正象鲁迅所说：“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惆怅。”这又何止是“说梦”，这是对鲁迅作品的肆意践踏，是对广大读者不能容忍的愚弄！我们研究鲁迅作品的语言，应该针对“四人帮”的“摘句法”、“附会法”拨乱匡正；对鲁迅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的某些唯心主义“考证法”也应防止，使研究的结论尽量符合鲁迅的原意和体现其匠心。

鲁迅作品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有的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出于针锋相对的斗争需要而采取的——我们分析这种情况下的独特用法，就要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具体语言环境(包括具体文章的上下文或全篇的基调)来考察；有的是

在作者思想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为着表达某种特殊感受的需要而采用的——我们分析这种情况下的独特用法，就要联系作者思想发展过程及其在当时的主导思想和特殊感受来考察；有的则同作者个人的战斗风格、语言风格有关——我们在分析这些独特用法时，还得联系其个人的风格特点来考察；有的还同汉语发展到当时历史阶段的特点有关系——我们分析这些独特用法时，还得联系汉语书面语言在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特别是“五四”前后）的巨大变化来考察。

为了便于进行科学的归纳和考察，使说明尽可能地带上条理性，我想分词语的创新用法、词类的精采活用、句子的特殊组织、标点符号的独特用法等四个方面择例说明。由于这些用法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的表达需要而采用的，因此，从手段和作用上来看，实际上都属于修辞问题。其中有的用法就可以从修辞格的角度进行解释；有的虽然在目前还找不到现成的辞格名称来解释它，但在语言实践中又为人们不谋而合地运用着；也有的虽是鲁迅一人的独创，但由于用法警辟，影响深广，已作为一种至理名言汇入全民语汇之中了；当然也有因时代背景、交往环境及个人风格特点等关系，某些用法只能作为鲁迅个人在当时当地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留给后人去研究。

鲁迅作品是一座语言的艺术宝库，它在全民语言中所起的典范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可惜至今语言学界、文学界专门研究鲁迅语言的著述寥寥可数；对鲁迅作品中那些独具匠心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更未见有专门的论著。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现象，应该归咎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极左思潮恶性发展的“四害”横行时期，研究鲁迅就只能谈他作为

革命家、思想家的一面，不能谈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似乎谈了后一面就是损害了鲁迅的光辉形象；研究鲁迅作品也只能阐发其思想性、革命性、战斗性，不能谈作品的艺术性——尤其不能谈作品的语言艺术，似乎一谈后者就贬低了鲁迅作品的价值。这怎么能够正确认识、评价和学习鲁迅呢？用这种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怎么不会糟踏遗产、堵塞学术发展的道路呢？现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已经推倒，他们那条糟踏科学、毁灭文化的极左路线已受到有力的批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春天又降临祖国大地，各种学术园地的景象，正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千姿百态。因此，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应该更深广、更活跃一些；比如对鲁迅作品的语言，就很有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又适逢科学文化复苏的新春时节，一切可以开发的空地——包括熟荒地和处女地都应该开发出来，一切有助于繁荣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努力与尝试，都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自然，应当申明：我们探讨鲁迅作品语言的一些独特用法，目的在于更好地领会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及其所以要那样表达的艺术匠心，而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提倡在写作时不顾此时此地的表达需要，去生搬硬套鲁迅在彼时彼地的一些独特用法。尽管鲁迅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中，能够英勇地突破文言文的重围，第一个用白话从事文学创作，成功地用新的语言去熔化和改造旧的语言，为我们奠下新文学语言的第一块基石，但由于他毕竟是处在文言和白话新旧交替的时代，因而他的语言也难免会带着从旧语言中冲杀出来的痕迹。这些痕迹，当然同我们今天的语言又有距离了。

这是不能不顾现在的语言规范化要求去盲目搬用的。还有，由于鲁迅用笔战斗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及其本人思想、感受的深刻性，因此他所采用的一些独特的语言形式，也必然会带上时代的特点及其个人的风格特点。这也不能不顾今天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时代特点，而盲目照搬硬套的。

我们应持的态度是：坚持语言形式为思想内容服务的原则，探讨鲁迅作品中的各种语言形式，并以鲁迅为榜样——根据当时当地写作的目的、内容、对象、体裁以及特定上下文的表达需要，灵活地选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充分发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作用。

一、词语的创新用法

在鲁迅作品中，词语的创新用法颇为突出，或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律，就现成的词语进行出色的仿造和翻造；或利用汉语的语音、语义及书写符号的特点临时造词寓意；或根据上下文的语意关联而易词转用；或适应具体语言环境的表达需要而灵活借用文言词和外来词。这一切都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在特定语言环境下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收到了一般用法所不能达到的修辞效果。这反映了鲁迅对汉语词汇的掌握和运用是多么精深圆熟！

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对词语的精当选用——包括某些创新用法，必须以掌握丰富的词汇为基础。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词汇反映着语言发展的状态，词汇越丰富、越纷繁，那么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就一个作家而言，词汇的丰富与否，也反映作家本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因而他所掌握的词汇越丰富，用词越熟练，他的语言也就越富于表现力。由于词汇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敏感，由于各人对词汇的掌握和选用的情况与特点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分析鲁迅作品中关于词语方面的一些创新用法，就不能不留心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时代特点和作者本人选用词语的风格特点。

应该看到：汉语词汇是十分丰富的。但是从秦汉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封建阶段，因

而词汇的发展也相当缓慢。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时期，汉语词汇第一次引起剧烈的变动，反映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新词也随之大量产生；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进一步地引起汉语词汇的第二次大变动——反映这个社会伟大变革的新词大量地产生和对于方言词、文言词、音译词（主要是俄语音译词）的吸收，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宝库。身经新、旧民主革命两大历史阶段的鲁迅，正处于汉语词汇这两大变动时期，这就为他以文学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在用词方面提供了充分选择和调遣的余地。鲁迅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语言的战斗力，他在用词方面所下的功夫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既善于从人民群众中博采生动活泼的口语来丰富自己的词汇，又善于从古代和外国作品中吸取有生命力的和必要的词语或词汇成分，并将它们熔冶于一炉，非常精当地运用于自己的作品，真正达到了“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程度！惟其如此，才能根据特定语言环境的表达需要，创造性地采取一些独具匠心的用法。这充分表现了鲁迅用词灵活自如、出神入化的艺术素养，显示了“鲁迅笔法”的某些特色。

（一）特 造

特造不同于生造。生造是鲁迅向来就反对的，他说：“不要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答北斗杂志社问》）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又可利用汉语的语音、语义及书写符号等特点，临时特造一些词语来适应某种特殊的表达需要。这虽然显得特别，但可以收到更好的修辞效果。这种临时特造的词语，除有的已成为高度概括的典型专称和警

句格言之外，一般并未进入全民语汇之中，在词典中是找不到解释的，因此只有从作者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运用情况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其具体含义及何以要这样用的匠心。请看下面几种特造方式的独特效果：

1. 利用汉语同音词的谐音双关作用，造词寓意

汉语里的同音词有两种类型：一是同形同音不同义，如“花钱”的“花”与“花布”的“花”；一是异形同音不同义，如“绘画”与“会话”。这是语言中的音少而义多的矛盾产物，它的存在不免要给语言的使用带来一些困难——有时会影响对语义的理解与表达。但事物是复杂的，正是有些词存在着声音相同这一点，又为我们创造谐音的语言艺术提供了方便。作为一位语言大师的鲁迅当然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选用词语时，一方面尽量避免声音的含混，力求表意的明确，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同音词的积极一面，创造种种含意深刻的谐音双关语。这在鲁迅作品中不乏其例。现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有时被鲁迅用来谐音双关的词语，并非全民语言中原来就有的同音词，而是作者根据表达的需要，寻求现实语境中某些词语在声音上的联系，临时造词谐音，收到一种奇妙的表达效果。如：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言论自由界的界限》）——引文重点，系笔者添加。下同。

这里抓住三个“明”字和“民”字的声音联系，特造了“三·明·主·义”一词，同“三·民·主·义”谐音双关，造成辛辣的讽刺。所谓“文人学士”，是指新月社中的某些反动文人，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的走狗；所谓“不识字的奴才”，是指《红楼

梦》里的焦大。焦大曾因酒醉骂了贾府，被捆绑起来，塞了一嘴马粪；新月社中的某些走狗文人，仅因对国民党“有了一点微词”，而遭到国民党报纸的“同声致讨”，但这些走狗文人善于讨主子的心欢，引据了一大堆“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又照旧获得了用《新月》刊物充当国民党御用工具的“自由”，继续兜售那“为文艺的文艺”黑货了。所以，鲁迅连用三个反语，说这些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焦大）“聪明”，“党国”也究竟比“贾府高明”，因而国民党所统治的“现在”究竟比贾府所代表的那个乾隆时代“光明”，这真是对国民党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所标榜的“三民主义”的绝妙讽刺！因此，作者把前面三句反语中重复出现的三个“明”字总括起来，特造了“三明主义”这个谐音双关的专用名词，就收到了一箭双雕的奇妙效果。

有时，鲁迅利用谐音双关，造词寓意，简直到了妙趣横生的地步。在《哀范君三章》里，就有写范爱农“白眼看鸡虫”的绝妙谐音字眼。范爱农由于受权贵的排挤、打击，虽已头发稀疏花白，但他不为反动势力所屈，敢于翻起白眼，藐视压迫他的权贵。这句诗，妙就妙在“鸡虫”这一绍兴方言（“几仲”的同音词的特造。绍兴话念“几仲”为“鸡虫”，而“几仲”即自由党主持人“何几仲”；尽管他仗势排挤、打击范爱农，但范爱农却把他当作卑微的“鸡虫”加以藐视。这里用“鸡虫”代替“几仲”，作“白眼看”的宾语，既表现了对何几仲的鄙视，又突出了范爱农蔑视权贵的刚毅性格。后来鲁迅自己也说：“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骂得实在痛快！

为了回敬敌人的攻击，抗议反动当局对自己的压制和迫

害，鲁迅有时也利用这种谐音双关的手法，特造笔名进行战斗。如：他在翻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时，就曾改“堕”为“隋”，用“隋洛文”的笔名，以回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所谓“堕落文人鲁迅”的通缉，因为“洛文”与“落文(人)”谐音；后来还以此衍化为“洛文”、“乐文”、“乐雯”等笔名不断著文进行战斗，昭示敌人“通缉”的落空。这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抗议和辛辣的嘲讽。又如他写杂文《知了世界》时，署名“邓当世”，又借吴语“邓”与“遁”的谐音，暗寓逃避当时反动当局耳目的意思，其中也深藏着作者对黑暗现状的极大愤慨。

由此可见，利用汉语同音词的谐音双关作用，临时特造词语寓意，是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进行战斗的方式之一。

2. 利用汉语传统的语义造词法，临时造词寓意

汉语已有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是依以构成新词的基础。按照汉语词素在造词过程中具体运用的特点，可将汉语传统的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和结构造词法三大系统。语义造词法是以词素的意义作基础，从它的变通和运用以造成新词的一种传统方法——或引申变义成词，或转化变义成词，或依据新旧事物反映在人们认识中所唤起的联想而比拟成词。在鲁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有时为了适应具体语言环境的表达需要，如何灵活运用汉语这种传统的语义造词法，临时造词寓意，收到特有的修辞效果。如：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时，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译成册子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时代我又见了别一种情形，起了别一种意见，不想在中国

人的愤火上，再添新炭了。（《杂忆》）

在汉语词汇里，只有“愤怒”或“怒火”之类的词，没有“愤火”这个词，但联系上下文来看，这里又只有用“愤火”最确切。用“怒火”虽然也能说得过去，但从“怒”与“愤”这两个词素的意义比较来看，“愤”的含义更能表达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积愤；用“愤怒”虽然含有“愤”的意思，但从“怒”这个词素来看，在这里还不足以表达特定语义境界，尤其是从上下文的配搭来看，“愤怒”则远不及“愤火”跟“再加新炭”的比喻意义配搭贴切。可见作者是多么精通汉语传统的语义造词法——精细辨析和挑选了“愤”与“火”这两个词素，并利用“火”的比喻意义，按照比拟造词的规律，临时造出“愤火”一词，恰到好处地运用在这段文字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又如《祝福》这篇小说中特造的“钝响”一词，也是经过精细辨析“钝”这个词素的含义，运用传统的造词法，将它用来跟“响”这个词素临时组成一词，以恰切形容当时鲁镇过年送灶的爆竹声。虽然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并无“钝响”这个词，但联系作者在这里所要渲染的沉闷气氛，实在令人叹服“钝响”一词特造得奇妙！

鲁迅灵活运用传统造词法，临时造词寓意，总是出于某种表达需要，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用的。这同他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讽刺意味，十分准确、鲜明、生动。有时特造某些专名，显得更为精采，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典型性。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杂文中，就曾利用英语音译词“摩登”作词素，跟“圣人”一词结合起来，组成“摩登圣人”这个新鲜名词，古洋结合，显得十分生动、活泼、风趣，且含有讽刺意味。还有不少特造的专名，由于具有高